

论“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图书馆的影响*

王一心

摘要 对于教会大学来说,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及与其联动的“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一场挣脱宗教控制走向中国化、本土化的变革。教会大学图书馆身处其中,必然会受到直接影响。我国学人从外籍人士手中接过图书馆的掌管治理权,使图书馆行政独立并直属校长,改变了以往重西轻中、种类单一的馆藏格局,开启了教会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新时期。参考文献22。

关键词 非基督教运动 收回教育权运动 教会大学图书馆 华人治馆 馆藏建设

Concern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Non-Christian Movement on the Church University Library

Wang Yixin

Abstract: For church universities, the Non-Christian Movement and associated Regaining Educational Right Movement occurred in the 1920—1930's were the revolution from getting rid of religious control to localization. The church university library was thus affected directly. Chinese scholars took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of the library from foreign nationals, and then made the library administrative independent and directly belonging to the principal, which changed the past situation of emphasizing foreign language books but looking down on Chinese books, and single collection structure, thus to open the new era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urch university library. 22 refs.

Keywords: Non-Christian Movement; Regaining Educational Right Movement; Church University Libraries; Management over Library by Chinese Peopl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西方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高等教育机构——教会大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整个存续期中,办学并非一帆风顺。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是在义和团冲击之后它所遭受的又一次大波折。“非基督教运动”所包含的反对教会教育、收回教育权等内容,导致教会大学的办学性质、宗旨、目的、方向等发生转变,促使其走向中国化、本土化。作为高等学府重要与有机组成部分的教会大学图书馆,随着学校蜕壳一般的变化也在服务理念、功能、馆藏、人员构成乃至宿舍建筑风格等方面发生了变化,并由此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 “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影响

1.1 “非基督教运动”与学界的关联

“非基督教运动”,顾名思义,乃反对、排斥基督教的运动。虽然它所针对的是基督教涉及的社会各个方面,但无论从运动发生的远因、近因,还是运动参与的主体,以及运动的肇始、过程、结果、影响来看,都与学界有着重大关联。

1922年春,以各国大学生为主体的基督教国际性组织——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宣布将在中国(清华大学)召开第十一届世界大会,并宣称基督教传教事业由此进入新纪元。此时距“五四”运动爆发虽已三年,但反帝爱国情绪仍激动未息。

* 本文系“江苏高校教育学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苏政办发[2011]6号)研究成果之一。

在这样的形势下,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的举动即被视为一种挑衅,上海学生率先做出反应,迅速组织起一个非基督教学生同盟,意在阻止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的召开,并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作为对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响应,以北京高校师生为主体的非宗教大同盟宣告成立,通电全国各界,呼吁抵制基督教大会。

教会大学可谓宗教的渊藪,并不讳言“为宗教”的办学目的,如华西协和大学 1908 年在筹办时拟定的办学宗旨是“借助教育手段以促进基督事业”,两年后学校开学时的章程更明确规定:“本大学之目的拟在中国西部于基督教主办之下,以高等教育为手段促进天国的发展。”^[1]持此宗旨的教会大学比比皆是,如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的调查所言:“教会高等教育之设也,其初心主旨,有欲以为养成牧师、教长之资者……欲以扩充基督教势力范围者……”^[2]

所以在“非基督教运动”之初,教会大学就成为运动矢的。1922 年 4 月,蔡元培在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大会上作过一个题为《非宗教运动》的演讲,提出教育应独立于政党、宗教的观点,以及教育与宗教分离的主张^[3]。三个月后,北京大学教务长胡适与该校教授陶孟和,以及学者丁文江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也提出反对宗教教育的提案^[4]。

1.2 “非基督教运动”促使教育权回归

收回教育权意为向教会学校主要是教会大学收回教育主权,“收回教育权运动”是由“非基督教运动”衍生出的一个更直接针对教会大学的运动,也可以说是“非基督教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非基督教运动”从最初的欲使教育脱离宗教控制的思想,转而集中到教育权归属的焦点上来。1924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通过了《取缔外国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两个提案^[5]。1925 年 11 月,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

《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得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校长须为中国人”^[6]等六条。

早在此前半年,面对来自社会的反对教会教育的巨大压力,教会中头脑清醒者已经认识到,教会学校的未来“全在中国公民之态度”^[7]。中华基督教教育会故而在 1925 年 4 月初召开的董事会年会上通过《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公开承认教会学校“应向官厅注册……”,还对中国化、本土化的呼声做出明确回应:基督教学校在“精神上,内容上,维持上,管理上,均应为中国的”^[8]。妥协的意味相当明显。

两年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于 1927 年 11 月发布《修正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9],关于收回教育权的表述和要求更具体、更明确、更严格。两届政府先后出台的针对外国人在中国办学的条例,将以学界为主体的一场社会运动的思想、教育诉求,确定为国家强制性法规,可以说是“非基督教运动”将教会大学作为重点运动对象、并且取得完胜的标志性成果。

2 “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图书馆行政管理的影响

“非基督教运动”创造了华人管理图书馆的机会,首先是其理念决定图书馆定位与走向的一校之长渐由华人替代了洋人,不同于洋校长的图书馆建设的思维与视野,华人校长直接加速了图书馆趋于中国化、本土化的进程。

从 1925 年 4 月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会年会上的一些文件内容表述中可以发现,“非基督教运动”给教会中人带来了压力与焦虑:“近来,社会中一部分人士对于基督教教育宗旨颇多误会”^[8]“外间对于基督教教育,深致不满……”^[7]明智的人已经看出教会办学前途的大势所趋,主张有条件地妥协。及至“非基督教运动”影响下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颁布后,多数教会

大学开始着手物色华人校长并增加华人董事。1927年有五所大学华人校长上任,之后两年又有五所大学新换华人校长。1931年时,13所基督教大学中只有圣约翰大学还是洋校长卜舫济,而时任代理校长的华人沈嗣良已在为申请立案准备材料。岭南大学新董事会1927年成立,19人中只有4人为美国人;华中大学立案时,16人的董事会中,同样仅有4人为外籍人士。各校立案工作多在华人校长就任后开始进行。而立案过程包括了为达到立案标准所做的准备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学校(包括图书馆等机构在内)趋于中国本土化的过程。

20世纪20年代末,随着对图书馆认识的提高以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大学图书馆人对提升图书馆行政地位以为图书馆争取更有效发展空间的愿望变得迫切,要求将图书馆从隶属于校总务处或教务处的三级部门改为与二处并立的直属校长的二级部门,即所谓的“行政独立”。在1929年1月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上,暨南大学图书馆与上海中学图书馆即分别提交了《学校图书馆行政独立案》《请教育部规定学校图书馆行政独立案》,得到图书馆的广泛响应。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大学图书馆纷纷按此改制,一些教会大学图书馆也在其中,如燕京大学图书馆、辅仁大学图书馆、齐鲁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等。行政独立并直属校长,使校长对于图书馆的责任更直接、更明晰,也使校长对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更关注、更主动。尤其对于教会大学图书馆来说,因为有“非基督教运动”下中国人替代外籍人士出任校长职位的社会背景,故而较之其他大学图书馆,更多了一层意义。

在校长之外,“非基督教运动”对于教会大学图书馆更直接更明显的影响,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替代外籍人士进入图书馆管理层。如刘国钧接替美籍克乃文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黄星辉接替美籍朗登女士任东吴大学图书馆主任,桂质

柏接替外籍巴达那任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10]等。有些图书馆虽由外籍人士执掌,但其助手或副职为中国人的情形并不少见,而这些中国人也多为未来的接班人。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海施女士的副手就多是中国人;齐鲁大学图书馆馆长奚尔恩先后聘请了桂质柏、皮高品等人总管图书馆事务;杨希章应校长刘湛恩之邀,于1928年在沪江大学图书馆馆长、美国人汤姆森女士手下任图书馆主任^[11],上海“孤岛”时期接任馆长;黄星辉在东吴大学图书馆任主任前,曾是美籍朗登女士的副手。

交由中国人管理的图书馆,大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原因,除了宗教的禁锢被打破、洋人治校治馆的弊端被革除之外,还与掌馆者是一群有抱负有思想有能力有专业素养的中国学人有关。种族与血缘使他们对东方文化更有一种理性难以替代的深切了解与天然亲近,使他们无论是观念立场还是情感本能地向中国倾斜,从而更好地推进图书馆的中国化、本土化。

3 “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大学图书馆馆藏格局的影响

昔日教会大学图书馆馆藏以西文文献为主,随着“非基督教运动”及“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勃兴、《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的颁布,中国化、本土化进程对高校课程设置的影响,以及各大学在向中国政府申请注册立案过程中为达到标准而做的相应调整,都使得教会大学图书馆藏书结构发生变化:一是馆藏中文文献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二是馆藏种类大为丰富,三是在图书馆文献建设中中文馆藏的“特色性”逐渐显露。

在以传教和培养传教士为目的的教会大学中,“宗教”课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排在首位,且列为必修课。虽然各教会大学也开设文学、理学、教育学、医学等课程,但采用的多是西方的科目设置办法和教学方法。这就决定了为宗教教学和西

化的科目设置提供文献保障的图书馆的藏书结构必然重西轻中,亦即早期的教会大学图书馆最重视的是西方书籍的收藏,馆藏资源以西文书籍为主。因宗教科目为学校的必修课,西方的神学书籍在图书馆馆藏中占很大比例。如,齐鲁大学收藏了大量的宗教文献^[12];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幽默大师林语堂回忆说,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那儿有五千册藏书,大约三分之一是神学书籍”^[12]。

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些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中文书籍远少于西文书籍就不奇怪了。如1920年夏,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黄维廉任代理馆长时就曾感叹“馆中中文书籍过少”^[13]。后其虽想方设法获赠,加上采购《四部丛刊》等,至1921年时中文馆藏数也只比1919年增约一百册,而同时段英文增加数为八百册。该馆1921年英文书总数为中文书总数的两倍,西文杂志则为中文杂志的四倍。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1921年时也是“所藏图书多为西籍,而中文典籍尚少”^[14]。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25—1926学年度西文书籍则是中文书籍的三倍^[15]。华中大学于1931年在教育部注册立案时,中文书籍近一万五千册,而西文书籍二万四千余册^[16],相差九千余册。1917年,齐鲁大学由三所教会学校合并新建时有中文书六千册,英文书一万册^[17]。五年后,即“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1922年,学校新馆落成时,英文书增加到一万三千册,而中文书仍为六千册^[18]。

中文馆藏数量的多少,小而言之,体现出一校对国文教育的轻重,这与教会教育观念有很大关联。如沪江大学有师生指出:“教会教育晚近之所以遭社会之反对者,厥故虽多,而对于国文教育之忽视,确为其最重要原因之一。”^[19]

大而言之,中文馆藏直观体现了学校中国化、本土化的程度,故而被作为衡量学校改制是否合乎要求的指标。《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中虽未对学校馆藏数量做出具体规定,

对中文馆藏规模更未有明确要求,但教育部在实际审理学校申请注册立案时,对馆藏指标却有严格考量,对中文馆藏也颇具倾向性。比如,1930年教育部即以馆藏不足为由拒绝了齐鲁大学的立案申请,而从齐鲁大学192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其馆藏尚属均衡。单从数量上看,中文馆藏并不逊于西文馆藏——中西文图书各约一万二千册,中文杂志种数甚至是西文杂志的两倍。而该校在立案遇挫后,随即大量购进书刊,1931年时西文馆藏增至15,190册,中文馆藏更激增增至71,094册^[10],这才获准立案。

为了弥补图书经费来源的不足,教会大学校方及师生想方设法募集资金以添购中文文献。“非基督教运动”风起云涌的1926年,沪江大学四年级学生甚至举行过一个“扩充中文图书运动”;圣约翰大学也有过“增购中文书籍”的举措;齐鲁大学在文理学院院长林济青的努力下,在1930、1931两年间,利用燕京哈佛学社经费,大量购买中国古籍善本^[10]。1932年,时任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副主任的金云铭得悉晚清太傅陈宝琛有意出让家中藏书,通过校长林景润夫人家族关系促成此事,以六千银元买下陈氏五世藏书共21,814册,其中包括大量珍贵的抄本、刻本等,堪称无价之宝,装满27架书橱^[20]。

政府法令的强制,社会风潮的催逼,加上学校师生的努力,这些因素从不同方面促使教会大学图书馆加大中文图书预算投入,西文馆藏占比奇高的状况遂有了转变,中文馆藏的数量明显增加。

在这方面,岭南大学似乎是个例外,因早在1922年就将馆长一职移交给中国人的特嘉(J. Ouglass),其在任时显然就对中文馆藏颇为重视。她将本校汉文教授陈德芸聘为馆中籍部主任,并在上海、北平等地劝捐,获得了丰裕的中文图书经费,故而岭南大学图书馆是“收回教育权运动”前教会大学中中文馆藏远多于西文馆藏的少数图书馆之一。该馆在收回教育权时中文馆藏是西

文馆藏的 2.4 倍,收回教育权的第一学年度(1927—1928 年),中文图书新增 6376 册,西文图书新增 1176 册^[21],亦即前者为后者的 5.4 倍。除此之外,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东吴大学等其他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图书,都在“非基督教运动”后逐年稳步增长。至抗战爆发前,所有教会大学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数量都已超过了西文图书。

当办学思想逐步摆脱僵硬的宗教思维走向宽容,学科建设及课程设置走向多元,馆藏建设由原来单一地为宗教思想灌输服务、为宗教教学服务、为宗教生活服务,渐改为为多学科的学术与教学服务时,馆藏必然走向丰富。

以服务于本校教学与学术研究为宗旨的高校图书馆,其文献的购藏必然会随着课程设置的改变而在数量与种类上做出相应调整。“非基督教运动”之前,教会大学秉持服务于宗教的宗旨使图书馆的藏书以宗教类为主,辅之以与教学课程相关的其他少量中西文书籍。而随着中国化、本土化背景下课程改革的推进,各教会大学增加了中国教育内容,国学课程相应增多。比如,华西协合大学在将宗教课由必修改为选修的同时,增设了中国语言、文化、历史、哲学等课程,又“聘请一些前清学士来学校宣讲中国儒家思想、书画艺术、诗词歌赋等”^[22];燕京大学在课程设置上“有缩有放”——缩减原先的宗教课,扩大其他课程范围如职业技术型课程,将畜牧专业扩展为农学系,新增社会学系、新闻系,加强文史专业的教学师资;圣约翰大学重视国文教育,不仅聘请国学专家钱基博任国学教授,孟宪承为国文部主任,还专门成立国文教学研究会。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除了教会大学常见的经学、宗教类外,还涉及哲学、历史、地理、社会科学、语言文学、美术、自然科学、农林科学等类别;金陵大学的中西文藏书涵盖了农林、生物、理化、文学、社会学、历史、地方志等诸多方面。

在如此变局下,唯宗教独尊的图书馆馆藏的清规戒律被打破,图书馆在文献购藏种类上得以开闸解禁,师生久被压抑的多种阅读需求得以释放。这些因素都力促图书馆在文献购藏中,兼顾诸学科的文献需求与读者的多种阅读需求,避免偏废,避免轻重失衡,使馆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在馆藏丰富之后,各教会大学图书馆又在本校特色学科与教学的基础上注重特色馆藏的建设。如齐鲁大学以本省为主,兼及北方其他省市,搜集了大量的地方志;燕京大学收藏的善本书以明、清刻本及抄本居多,也有宋、元版本和石刻草目、善本方志题记、《崔东壁知非集》等;岭南大学内除了文理学院,还特设有农学院,农学书籍是图书馆藏书重点之一;金陵大学的课程设置有,农业学科占有重要地位,图书馆因此特别增设农业图书研究部,并将其作为一个特殊部门;东吴大学重视法学学科建设,图书馆馆藏即以法学为特色。

教会大学图书馆借助“非基督教运动”之手,剥去了宗教加诸其体的紧身衣,馆藏的种种禁忌被打破,广收博藏的基本原则得以重新建立,为读者开阔眼界、解放思想提供向导的功能得以恢复。随着“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教会大学图书馆步入了事业发展的新阶段。

参考文献

- 1 马俊之.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5.
- 2 中国基督教教育调查会. 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72:99.
- 3 蔡子民. 非宗教运动[N]. 民国日报,1922-04-13(04).
- 4 胡适,等. 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的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J]. 新教育,1922(3).
- 5 杨天宏.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J]. 社会科学研究,2006(5).

- 6 教育部布告第十六号[Z].政府公报,1925(3459):3.
- 7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董事会年会议决案一览[J].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5(3).
- 8 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宣言[J].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1925(2).
- 9 教育部令第一八七号[Z].政府公报,1927(4160):4.
- 10 张德明.西化与改革:齐鲁大学图书馆历史初探[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2).
- 11 陈祖怡.上海各图书馆概览[M].上海:世界书局,1934:135.
- 12 林语堂.八十自叙[M].北京:宝文堂书店,1990:26.
- 13 黄维廉.约翰大学图书馆[J].新教育,1923(1).
- 14 邓光禄.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45(4/5/6).
- 15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248.
- 16 私立武昌华中大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一览[Z].1931:11.华中大学档案全宗,卷宗号:57.
- 17 私立齐鲁大学.民国十年最近改正齐鲁大学章程[M].济南,1921:18.
- 18 私立齐鲁大学.山东济南齐鲁大学章程[M].济南,1926:18.
- 19 影.扩充中文图书运动总务委员会[J].沪江年刊,1926(11).
- 20 黄涛.大德是钦:记忆深处的福建协和大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129.
- 21 李应林.私立岭南大学十六年至十七年度报告[J].私立岭南大学校报,1928(6).
- 22 刘洁.华西协和大学的中国化——中国基督教大学演变的个案分析[J].科教文汇,2008(6).
- (王一心 副研究馆员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收稿日期:2016-04-06